

著名世界譯漢

未來的世界

(中)

著 斯爾威
譯 熙懿楊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楊 H. G. Wells
良懿 著
炯熙 譯
校

漢譯
世界
名著

未
來
的
世
界
中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二集 明日之後 衰敗時期

一 倫敦會議舊制度的失敗狄克推多與法西斯蒂的蔓延

在前幾章中，我們已詳論十九世紀的資本制度，直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之間，因工業生產的不平衡，貨幣制度的繁雜錯亂，以及政治措施的不得其當，遂爾日趨沒落。既無恢復的潛勢力，又乏充分發展的新制度，可以取而代之；於是乎一幕幕的慘劇便接踵而至。

當時唯一的而實際上並不聯絡團體合作的工具，便是個別的主權國家，不是君主立憲，便是國會的民主共和國。國會是根據於全體人民或大部分基於無道理的選舉制度而選舉的。那時代便叫做民主政治時期。民主政治的解釋，昔與今異，並不是人類根據了各個的才能而享有平等的機會去服務及在團體事業中有發言權；也不是一個小團體享有平等權利之謂。牠乃表示一種特

殊的政治意見：國內每一個人民都同樣地能作和團體決議一樣的決議。

再古一些的共和國，如迦太基、雅典、羅馬等國都是貴族階級的。所謂民主政治共和國，就是說，在這種的國家內，每人都在政府裏享平等的權利的，這種少見的事例，祇在十八世紀末期，烏力（Uri）、安度拉（Andorra）那些窮鄉僻壤的地方是曾經有過的。此外便舉世無所聞了。牠們的政治是比較地簡易，而為一般的人民所能够明瞭的。

到了歐洲的盛大時代，人事便作了一個分水線，十五世紀的書籍與討論的高潮，使當時成了一個紛亂的時代，對於時代的宗教信仰與忠君的學說都作破壞的抨擊。新經濟勢力的發生，促使舊的封建制度趨於崩潰。向外發展與貿易，新的經濟狀況，工業發展，創造了新的人物，不自知其勢力的大小，祇需要着、要求着新的自由。他們不能明晰地知道所需要的是甚麼，也不知道他們和舊制度中的人物，有何區別，更沒有具體改革人類關係的觀念，像柏拉圖於兩千年前所描寫的一樣。柏拉圖所主張的養成專心的與有訓練的統治階級的計畫，雖有莫爾（More）想試試看重新提倡，他們還是不知道的。他們祇是應付着當時的環境事物。他們祇是憤慨世襲的貴族階級，不置信

於一個專制的君王。

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運動的要點，是反對『身世』和『權利』，反對世襲的少數的階級依據了傳統的經義而獲得統治和利益的壟斷。因為這種的革命是許多精悍而又懷仇的人們的革命，而精神上與社會上都沒有固定的組織，所以在運動的初期中，便採取了人民政治平等的形式。

十六七世紀的急進派，並不是想建立羣衆的政府；而實是因為他們痛心疾首於當時的統治階級。他們是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革命的少數分子，來激動那些慣於服從的多數人類，使跟着他們走。這便是歐洲盛大時代中民主政治運動的普通特質了。羣衆表面上似乎是在那裏要求着和決斷着——但實際上是不竭地被人利用和領導着。在這些世紀中，出類拔萃的個別領袖，其風靡一時，比較君王與主教，尤有過之，無不及。世襲的專制君主中，祇有一二人如阿蘭治的威廉太子 (William Prince of Orange)、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 (Fred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是歷史上很彰明的人物，可以和那些新式人物如克林威爾 (Cromwell)、福祿特爾 (Voltaire)、彌拉坡 (Mirabeau)、華盛頓、葛拉德士吞 (Gladstone)、羅伯士比 (Robespierre)、拿破崙或馬克思齊

名於史冊。

其後在英吉利、亞美利加、斯干的那維亞、德意志、芬蘭諸國之中，同樣地有少數不滿當時現象及好權慾的婦女，也起而替大多數不聞政治的婦女爭取選舉權。但是她們所成就的，不過如此而已，除了女性的擁護以外，當時的婦女對於世界問題的解決，甚少貢獻，其實可說並沒有甚麼貢獻。社會心理的研究，仍是只在解釋那個曾經在全美洲與大部分歐洲中暗中支配人心幾十年的民主政治的信念。甚至當時著名的思想家，也有很深的隱藏。他們內心裏對於真實的暴露很是不害怕；他們本能上就想將他們的異端委曲求全以符合那些業已成立的偏見。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初步觀念是一種很遼遠的、很簡單的小共和國，就是：有着強健的公民，在錢財及能力方面是一律平等的，以市民大會來處置國家的大事，可以自由發表和取捨意見。所有舊的民主政治，包括羅馬共和國在內，就學理上說來，都是爲這樣的市民會議所統治的。至於那些公民，便幻想着他們是在那裏靜中觀察，自由發言，而且充滿着智慧。

把這個思想伸張到替代封建制度而興起的新的大的社會裏去，便有很大的困難，而且如果

仍把公民視作社會的主權者，還未免顯得荒誕無稽。但是當時又有廣播的強烈的恐怖，如果不是這樣去維持權利，加以限制，則專制必有回復之一日，於是乎，他們便很勇敢地接受了這個神祕的解釋。無論用甚麼的代價，以前的不平等是不容復活的了，這是當時在萌芽中的資本家的心理，於是人們便由一個桎梏中掙扎出來，而走入另一個陷阱中去。

人們感覺盧梭所倡導的人類的本來德性論，特別有用，特別有效。普通的人，如果不爲牧師與君王所左右，他是永遠對的。於是乎普通人便成了一個神祕的、通達人情的人物，和上帝一樣，他的祭壇是選舉壇，他的神諭是投票箱。在歐洲盛大時代的這位上帝，雖然進展得似乎遲鈍一點，但人們相信他是絕對的。一切的事物便可以這樣進行着。卽如林肯所說，你可以長時的欺騙一些人，又可在有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但是你不能夠長時的欺騙所有的人。至於想達到引起戰爭或利用經濟情況的目的，欺蒙的手段，便更要利害了。

於是這種環境便產生了一個最高度的愚民政策的報紙。

這些奉命於天的人民，在緊急的政治與經濟的啞謎之下，顯得智力遲鈍了，破壞死亡近在目

前，隨着二十世紀的開展而壓迫到人類的身上來。一九三二與一九三三年的軍縮會議與經濟會議的經驗，各國國家立法所引起的重大反抗，獨獨捨去褊狹的自利外交政策不提的現象，以及整個世界不能協力拯救經濟崩潰的情形，遂暴露了國會制度的民主政治的最後的破產。

世界上的統治者的不能去掉他們畢生所有的對一班無知偏激的選民演說的習慣，以及他們那種固執的對於明白表示的嫌惡，就把一切可達到實際的功效都破壞了。他們藉口是一個純粹的代表機關而不敢擅自採納任何有效的提議或新奇的舉動。在他們的背後，讀者們覺得那些可憐的秉命於天的羣衆——投票者，很容易被鼓動，恐慌地拒絕奇的、勇敢的或急進的計劃，很容易跌入愛國的牢籠，很容易便受驚恐與瘋狂地捲入戰爭的漩渦，而且很容易爲顛倒黑白的流言所鼓動，至不能置信於其所當信仰的人。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報紙，不論是僱傭的或黨派的，祇顧在那裏煽動他們的下意識的情感，而並不向他們的智力與良心作一絲的感動。

投票者——羣衆既沒有教育來指導他們，亦無真誠領導的組織，便是這些會議毫無實力的根本原因。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是兩者之中較爲重要之一。軍備與軍縮是不着實際的虛浮的象徵，

但經濟生活卻是根本問題。這個倫敦會議供給今日的社會心理學家無上的研究資料，就中使我們大惑不解的事情很多。當時出席會議的人物，其智力並不減於今人，根據康拜（Moreton Canby）對於會議中提出種種條陳的詳細分析所得，證明他們深悉當時世界的所需，然而因為受到背後的羣衆與報紙的掣肘，以及這些人不可捉摸的衝動與怨恨，他們便鑄成了一個大錯，比較凡爾賽的冒昧，更是過無不及。

倫敦會議所以成立，是爲補充以前會議的遺漏，輔佐威爾遜的政治組織，將他所未能預見或故意避免的貨幣與經濟的錯亂問題，加以整理。在開會之初，迷離中，現着在卑爾的貨幣國聯的陳述，以及其他關稅會議的事實。於是循環性的歷史，又使這個第二次的世界會議，爲一位美國總統而且同是隸屬於民主黨的，佔會議中一個中堅的地位。而且照樣，依其民主黨的禮法來虔誦哲斐孫（Jefferson）的名號，一如共產黨誦念馬克思的名號，回教徒誦念穆罕默德的名號一樣。這便是羅斯福第二。他比較他的前人所留的印象淺些，因爲他參加歐洲的事情不久，但當他被選爲美國總統的前後數月中，以及主持倫敦會議的時候，舉世交相傳語，一位真的『人』已經起來了，他將

清楚地觀察事物，明白地向人類進言，把舉世由困苦與不適中解放出來。但是他失敗的唯一事情，便是他沒有明白地說話。

由威爾遜個人的失敗中所得的教訓，便是他並不是到倫敦來出風頭的，並使他的談話，爲人們作密切的研究。他寧可由他的船安波甲第二（Amberjack II），遠在喃塔刻特（Nantucket）的海港中，從傳遞者的手中交換訊息。安波甲第二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並不亞於福特的和平之船。其動機與缺點都是有同樣的重要。

會議開幕漸近，人們到處傳問：『這是不是我們最後的救主呢，還是再候第二位降臨呢？』歐洲每一家書店都出售着他的新出版的書前瞻（Looking Forward），去細細地研究他的心理。這本書很使一班懇切的人們紛亂。很明白地，這個人是很堅決、忠誠與可親的，這一切都由篇首的照片所表示的清澈坦白的眼光和闊大而且有堅決神氣的面部顯露出來，但是這本書卻是一本政客的讀本，充滿了好意，點綴着一些模糊的當代思想，但是缺乏了智力的理解。『他是好的，』他們說：『但僅僅乎好便够了嗎？』

雖然如此，希望仍在奮鬥中。除了羅斯福之外簡直沒有第二個人肯答應驅除這個困壓人類經濟生活的鬼魅的。如果羅斯福不主持會議，便沒有這個會議了。雖然他的書，不免使人感覺失望，但人們仍存了些希望的理由。特別是因為羅氏有一個『智囊團』（Brain Trust）的諮議組織，包含許多知名的有才幹有新思想的人物，如特威爾（Tugwell）、摩利（Moley）和迪更生（Dickinson）等。他們後來對於改革法律與政治的工作都極為重要，這也是美國對於新式國家思想的一個大貢獻。羅氏和這班人過從甚密，而且樂於採納他們研究所得與運思成熟的意見。於是觀察者便認為如果他肯聽這顧問的話，事情尚有可為。羅氏比較其他歐洲的政客與執政者總算稍勝一籌，因為他們是專聽銀行家與大企業家的話的。

但他是否在那裏聽呢？他是否抓住了這個三角形的問題的重要性質呢？他似乎明白，減除債務與資本過剩的負擔，要在通貨膨脹，他也知道有擴張公共事業的必要；對於這些他都是很清楚。假使這並不十分明顯，他對於『公衆』及『公衆協助』這兩點之間，發生猶豫，那是又當別論，不過這是另一問題。但是否他對於應否使這種計劃世界化也是同樣地精明呢？對於這些，他的態度

屢有變更。這種變更更是反覆無常呢，抑或是外作虛飾，而內蘊堅定的目的呢？當舉世需要坦白言詞，簡捷思想的時候，而用這種虛飾的策略是否得當呢？他治病之方似乎很紛亂。無疑地他聽信他的顧問，但是他不是也聽信於任何人嗎？他是在那裏和複本位幣制賣弄風情。似乎沒有一樣藥餌不去嘗試一下的。

會議開幕之初，故示鋪張，煊赫一時；旅館有人滿之患，街道高懸旗幟，招待的秩序非常隆重，而且天公做美，風和日麗。英王與首相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的開會詞，成了今人很奇異的一種讀物。他們表示對於人類危機有着深刻的認識。他們反覆申言這次會議如果失敗，便可以引起世界的禍亂。他們諄諄然於世界合作的必須，貨幣簡單化，與回復僱工的重要，一切我們都認為是很真實的事情。但他們卻沒有致力於使這些重要的目的如何地達到。如果他們不明白當時的環境大勢，便不會作這種呼號。但不久，他們便把精神移到旁的事情去了。這種既堅決而又不力行的混合心理，實使我們大惑不解。如果他們看見了當時環境的大勢，一定沒有整個的看清楚，因為他們並沒有看見前面有任何的世界舉動開展着。

侯爾 (Cordell Hull) 是美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也是一位很偉大和高尚的人物。他的嚴肅而瑋麗的演說詞——具備了美國傳統虔誠的特質，成了歷史上的名言。其中有幾句話說：『自私之念必須擯除。如果——天日也不容許的——有那一個國家爲了本國的利益而破壞這個會議的，那個國家便要爲人類所咒詛。』

達拉地爾 (Daladier) 法國的國務總理開始也作極端寬大而穩健的言詞。他補充英國代表的兩個演說詞中省略了的事情，力言全世界有發展公共事業來吸收失業工人和恢復消費的重要。美國代表，在第二星期，也參加了這個戰線。但經過這些煊赫輝煌的情況之後，會議便轉去細小的事情上面了。很明顯地，牠不能把『真實』 (Reality) 的水平線提得太高。每個代表都感覺在他們背後的羣衆與報紙的威脅。於是國家主義的代表，開始很明顯地表示不能爲了普遍的利益而把國家的利益犧牲，不久，便連甚麼是普遍的利益，也有些莫名其妙起來。世界經濟會議無形中便變爲世界經濟衝突，即猶之乎國際聯盟變作一個外交交易市場一樣！所有開幕時一切的高談闊論都匿跡消聲，因爲世界的心理尚須顧慮這三重條件下的道德與教育的力量，與尚未願意去

接受他們所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合作。自私觀念，便成了當時出席代表的一個不可救藥的心理上的隔膜。如果實行起來，便非犧牲一切的現存狀況不可。被舉做國家代表的人物，怎能把國家的利益和別國混合呢？不錯，他們都準備來改革世界現狀，化愁苦作希望。但是有一個不可移易的條件，那就是他們自己不改變，而且凡與他們自己有重要的關係的都不能變。無疑地會議的開端思想是很對的，但是牠怎能敵得過出席者的各別勢力、黨派與國家的自利主義呢！

很不可解的，便是蘇俄的代表對於解決這個世界的啞謎，並沒有做一點事情。後世論者多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是今日的新式國家的前驅。但這卻沒有連接的關係。新式國家之發源，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一樣，同是為社會的必要，與建設的動機所造成的，不過是比較獨立、成熟與精密一點的革命思想。蘇維埃的制度，的確具備了許多今日制度的特點，即如牠的國際思想，牠的真的社會主義，尤其是牠的專誠統治的共產黨的組織，替我們今日新式國家會友（Modern State Fellowship）開了先河。但在俄國，言論與實行是相差得很遠的，而李維諾夫（Litvinoff）代表那在實驗中的俄國的，是太過注意於他本國與西方各國相互間的事情，如貿易上的封鎖港口、信用

上的困難等等，而不知藉此機會去向全世界爲人類請願。他絕對沒有將共產主義的原則來應付世界狀況。世界需要計劃孔亟，而他沒有爲世界貢獻一個五年計劃或十年計劃。環境需要全體合作甚殷，而他絕不敦促世界的社會主義的實現。很明顯地，他已忘記了爲全世界打算和其他資本主義代表實無以異。他是把俄國的利益和其他國家作相對看，和普通的資本主義的愛國者並無兩樣。

其他各國的代表，便更顯得眼光淺狹，毫無感動。因爲演說時間的有規定，他們都是把人道主義的事情簡略的說幾句便提到他們本國的事情。祇有愛爾蘭的代表康腦利 (Connolly) 反對出席代表的模糊態度，而請求他們去思維一個可能的學說，不要管牠是如何的不合正統。但是他自己的演說詞也不見得有甚麼建設的思想。他正在對於英國對愛爾蘭出口的封鎖，深懷繫念，便把全副精神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據康拜的觀察，新式世界國家的思想，在會議中英、美、法、俄的代表發言中，都具了隱藏而不結實的形式。在美國的立論中，牠是被個人主義者的言詞與謹慎處所隱蒙着，在英國的，牠是爲帝國

主義的觀念所遮閉着，在俄國的，牠是爲馬克思主義的虛偽的心理粗糙的謔語弄得索然無味。第一、商人不肯改革不甘退讓；第二、帝國主義的統治者予以拒絕；第三、空論的黨人加以阻撓。愛國的情感，黨與人的關係，便橫梗着公共原則的實施。雖然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新式世界國家的觀念已於一九三三年的會議之中，略示梗概。差不多人人都覺着這未來的靈魂的出現，雖然衰敗時期的最慘淡的日子仍須降臨，雖然人類還須度過一二百年的痛苦生活，纔可以把這個思想成爲一個真實的人類政治生活。

——康拜又說：這個靈魂並未成爲有形，因爲還沒有成形的質料。世界上每一個大國家，都感覺有趨向一個永久的進步的『世界國家』的必要，但是這種片面的與局部的了解是尙不能達到目的。他對於羅斯福緊迫眉睫地努力於改革美國的事情，特別注意。羅氏深知必須以通貨膨脹來解除債務，但他不能禁止自由投機的事業。他所應付的是一班老奸巨猾的投機人物，他向他們請求甚至威脅他們加以坦白的援助。他既缺乏適當的行政組織去管理大的公共事業；所以想把美國的技术人員，轉瞬間，由類似的經濟操縱者變作忠謹的公共僱用人員，是絕不可能的。所以他便

以社會主義來向圖利者恫嚇，欲使他們放棄私利，而把工業組織在『利他』的基礎上，至於社會主義，他又無管理的階級去實施牠。他對於歐洲人的心理的不明瞭，難於求互相的了解，和他以前的威爾遜一樣。所以便成了相互的誤會，而他的態度卻是自負和挑釁的。會議未終，他已作詬罵了。到了一九三五年，人們把美俄兩國作一個相反的平行比較。每一國都是向着一個組織比較科學化的國家的階段競爭，而每一國又都在初步的政治管理生產效能上感覺困難。技術家與政客尙有待於合而爲一。每一國的獨裁都是與投機者及圖利者相搏戰。大家對於大同的合作都存了一些很微薄的希望，但不久便實際的集中於國內繁榮的建設上去了。但是他們是由兩個相反的生產效能與社會觀念的出發點向同一的目標進發的。羅斯福的出發點是民主政治的個人主義，史他林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英國的制度與其他世界各國則在經濟破產的混亂狀況中偏向保守。於是乎便沒有找出一個貫通世界好感的解決方案。

倫敦會議絕對比不上簽訂凡爾賽和約時那麼有聲有色驚天動地。牠沒有一毫成績。牠是虎頭而蛇尾的。凡爾賽還產生了一個怪物，倫敦便甚麼東西都產生不出。這樣冠冕堂皇的開端而至